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究系列课题

张卫国 赵炳新 等著

鲁苏沪浙粤 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



社

山东省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究系列课题

鲁苏沪浙粤经济社会 发展比较研究

张卫国 赵炳新 等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苏沪浙粤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张卫国等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8

ISBN 7-209-03724-1

I. 鲁... II. 张... III. ①经济发展-对比研究-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②社会发展-对比研究-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
IV. F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13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1.25 印张 27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山东省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究 系列课题编审委员会

主 任 王修智 朱正昌

副主任 王 敏 张全新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 敏 王希军 王修智 包心鉴

朱正昌 孙建生 孙建功 宋士昌

张全新 郭庆良 商志晓 黄泽存

主 编 王 敏

副主编 张全新

前 言

坚持以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是中共中央对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他在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强调,“理论研究只有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多彩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他要求,“广大理论工作者认真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不断作出新的建树。”按照中央的要求,省委在前几年已经开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课题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协调充实力量,加强重大课题的研究,在2003年6月中央做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重大部署后,围绕落实中央的部署和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又规划了一批重大研究课题,旨在促进学习,引导思考,推动工作。

重大课题的研究在省委领导下,由省委副书记王修智同志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朱正昌同志负责,省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党校、山东社会科学院、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委高校工委和省教育厅等部门的同志共同参加,组成编写委员会,王修智

同志和朱正昌同志任编写委员会主任,省委宣传部具体组织协调。重大研究课题的总体框架,依据中央和省委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要求,依据加快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依据研究工作要体现前瞻性、战略性的要求,初步确定了20多个课题,既有理论方面的研究,又有结合山东实际的工作研究,涉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加强党的建设、半岛城市群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发展民营经济等各个领域。课题研究中,注意了加强协调,整合力量,协作攻关,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组织作用,发挥各方面研究力量的作用。在形成初步研究成果后,编写委员会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认真审读修改,确保研究成果的质量。

开展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是推进伟大事业的迫切要求,是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的职责。面对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紧跟实践的步伐,研究新情况,开启新思想,解决新问题。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还会产生,涉及重大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的内容还将扩展,需要回答的问题会不断增多。我们将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深化认识,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取得新的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实践。张全新、王希军、邵炳芳、张汝金、周国栋等同志参与了课题研究的协调组织及校对工作。

编者

2004年5月

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现代 商业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鲁苏沪浙粤经济社会发展比较》代序

韦 森

在 2003 年下半年一个晚上,正在我们复旦读博士的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研究员来舍下小叙。在闲聊中,卫国君谈及他和山东以及其它一些省市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正在筹划撰写一部有关山东、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五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比较的专著一事,并盛情邀我为这本书作序。

自 1987 年从山东社会科学院出国留学,到今天转眼已近 20 年了。2001 年从英国剑桥访学正式归国后,虽然曾一两次偶过山东,但严格来说,自己对家乡山东这些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并不多。从国外来复旦教书数来也算几年了,但由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抽象的理论经济学或言元经济学(meta-economics),加上回国以来基本上是从书房到教室,很少外出,且很少读报纸、看电视,故对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各省市以及全国的实际经济状况也知之甚少。在此情况下,要为这样一本五省市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的专著作序,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

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和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在国际上以及在国内,目前这两门学科还都是比较抽象和思辨的理论学科。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多是些跨国家、跨社会和跨历史的

比较。这部专著,则集中于中国五个发达省市在 20 余年改革开放历史跨度中的经济绩效方面的多维比较。这些绩效比较固然与比较制度分析的体制和制度理论比较有很大不同,但从自己专业领域的观察视角来看,比较中国东——南沿海五省市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绩效上的差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中国这五个相对发达的沿海省市各个方面的比较,进而发现各自市场运行、文化习俗以及体制绩效的不同特征及其各自的优劣长短,对研究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向,尤其是对正确把握我们山东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对省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制定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对本地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各界研究和理解山东省情并进而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一些合宜的咨询意见,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山东是生我、养我和教育过我的家乡。作为一个出身山东的经济学人,能为家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一些个人的评论,提出一些自己浅见——甚至谬见,实在是责无旁贷的。加之,承蒙我曾工作过数年的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和朋友诚挚邀请,这也真是盛情难却。于是,就有了这篇书序。

下面,笔者仅从几个方面谈一点自己的一些“印象直观”。希望这些浅直甚至有些“外行”的印象直观,能为关注和思考着山东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学界和社会各界的朋友,提供一些进一步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一、与其它四省市相比,山东综合竞争力和体制绩效到底若何?

自 1978 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各项指标也显示山东这些年确实取得了“令省内人乐道”和“令省外人士刮目”的巨大成就。统计资料显示,1978 年至 2002 年,山东 GDP 的年平均增长速率为 11.6%,高于全国同期的 9.4% 的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上海的同期水平。2003 年,山东 GDP 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 13%,要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4 个百分点以上。2002 年,

山东的人均 GDP 达到了 11,645 元,虽然低于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但也高出全国 8184 元的平均水平。这些基本数字表明,自 1978 年以来,山东人民在改革开放中确实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然而,我们山东的各级党政领导以及学术界——尤其是我省经济学界——的同仁显然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由张卫国研究员所牵头并组织的山东与江苏、上海、浙江和广东跨省市的比较研究,正好反映了我省政界、商界、学界和社会各界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奋发精神。毋庸讳言,尽管过去 20 余年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了骄人的进步,但与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这 4 个中国最发达的省市相比,无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进程方面,山东均有落后的地方。在经济绩效、市场发育、体制安排和发展前景方面,山东也有待反思的地方。这些不合意的地方自然也能从一些基本数字上反映出来。按照本书第四章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 1978 年,山东的人均 GDP 为广东的 1.17 倍,浙江的 1.34 倍。但是到了 2003 年,山东仅相当于广东的 79.2%,浙江的 69.3%。读了这部书稿,感觉到有一点更为令人惊讶的是,在 2003 年,山东的人均 GDP 不仅排在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之后,甚至还在福建和辽宁之后,——而众所周知,辽宁这个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重工业基地,由于背上了巨大份量的国有经济包袱,其改革的步履维艰在中国和全世界经济学界都是人所共识的。把来自各方面的统计数字放在一个盘子中综合思考,看来我们山东的政界、商界、学界和社会各界是应该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省到底存在那些差距和问题——如果有差距和问题,其原因和起因又到底在哪里了。这些年来,由于笔者的专业是理论经济学(严格来说是经济哲学),故素来对统计数字不甚关注,也自然对一些统计指标不甚敏感。加之,自己十多年在国外,回国时间不长,目前确实不知道我国和我省历年的统计数字到底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在 1978 年上大学前,笔者曾在一个鲁西南的县城棉厂做过统计工作数年。记得那时,我们统计人员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俗话:“统计,统计,三分计算,七分估

计。”在文革后期的那年头,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我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也对此体会甚深。改革开放 20 余年来,我国的统计工作显然已有了很大改进,科学了许多。但目前我们国家和各地区的统计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一个连带的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经济表现统计数字——诸如 GDP 年增长速率、物价消费指数等——又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其中有多少估算成份?这仍然是些不成问题的问题。笔者这些年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在国际上许多著名大学学习和工作过。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使自己对各国以及各地的统计数字是否真实反映出了现实经济状况和绩效这一问题,总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里我们不仿以印度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历年统计数字,在过去十几年中,印度经济的平均年增长速率在 6% 以上。这比中国少不了多少。因而,这些年笔者也一直相信,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绩效应该一直不错。然而,在 2003 年 9 月,笔者有机会赴新德里参加联合国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在会议前后,笔者有机会对印度做了一些实地观察和走访。通过观察对比,笔者深感印度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这些年应该比中国落后很多。在印度的实地走访时,以至到从印度回来后数月,一个问题常常萦绕脑际而挥之不去:印度整个国家仍然是这样的穷,如此落后,如果印度过去十几年确有 6% 的年经济增长,那么这些年的增长到底增长到哪里去了?

把中国—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置换到中国内部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道理可能有相同和相通的地方。很显然,要做省际间经济绩效的比较,统计数字比较是重要,且是比较分析不得不用到的首要方法和考察问题的第一个维度,但这并不是也不应该只是惟一的维度。经济学家们的理论研究要依赖统计数字,政府咨询机构的发展意见和建议要参考统计数字,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和战略决策的制定也须基于统计数字,但要真正理解和正确把握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绩效方面的差异,单

纯依靠统计数字就远远不够了,而现实观察和多维综合审视,则就是不可缺失的了。

近两年来,笔者有幸利用参加学术讨论会、讲学和探亲的机会到过珠三角和长三角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和状况有一些“走马观花”的初步印象。从英国、欧洲和澳洲回到中国,看到这些中国沿海发达地区农民所新建的一幢幢漂亮小楼,看到笔直的高速公路以及在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豪华大巴和高档轿车,再看到一片片用塑料大棚搭起来“现代化”的农田以及一些现代化的民营企业工厂厂房,我有时真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欧洲、澳洲、日本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已没什么多大差距。要说这些地区经济没快速增长,谁能信?

同样,在近一两年,笔者也利用出差、开会和旅游的机会到过中国西北和北方一些地区。从来往中国北部和西北地区的火车和汽车的窗口上望出去,发现大多数农村的农居还是具有砖瓦甚至泥土结构的简陋房屋,有些地方甚至仍然是泥土草棚。另外,与十几年前相比,尽管这些地区的一些县城、地区城市和省城的街道开宽了许多,也新建了许多漂亮的高楼,但从这些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和实际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来看,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差距是很大的,更不用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了。有长三角和珠三角发达经济地区的“满目现代化”作参照系,一个问题也自然是:如果说过去一、二十年中这些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按统计年鉴)说来也不低,社会发展绩效也不差,那么,其增长又增到哪里去了?发展指标又有没有水分?

于是,我就有了以下一个不甚成熟想法: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既可以是统计得出来,也须是看得见和最起码体悟得到的。道理说来简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是增长在居民的银行帐户中和个人钱包中,因之没转化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明显改善,这种增长肯定是有问题的,人们也有理由对之怀疑。从这个视角来思考问题,一个自然的结论是,就任何国家、社会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路

径和经济绩效的比较而言,数字是重要的和必须考虑的,但数字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浅层发展比较的根据是数字;深层发展比较就须基于现实观察和综合审视了。

与广东、浙江、江苏和上海这些中国改革开放后最发达的省市相比,我们山东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些年的绩效到底如何?统计数字已表明了我们有差距。差距在哪里?差距有多大?如果一个山东人到宁波、绍兴、温州、苏州、无锡、中山、东莞这些江、浙、粤的一些中小城市走一遭,再到上海、杭州、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的商厦逛一逛,也许就会体悟到差距在哪里了,也就会知道差距到底有多大了。

与广东、浙江、上海和江苏相比,山东确有差距。这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与其它四省市相比,山东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在哪里?

中国沿海五个发达省市近些年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体制绩效方面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要回答和理解这个问题,这里不如换一个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些年这几个省市各自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和促动因素分别都是些什么?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在市场发育和制度变迁的渐进过程中发生的。江、浙、沪、粤、鲁经济的高速增长,自然也不例外。根据这一事实,一些制度经济学家也许会直接解释道,中国尤其是其东——南部这些沿海五省市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是中国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的一个历史结果。这说来没错。然而,这只是回答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更深层面的问题是,既然中国各省市和各地区的市场发育和经济成长都是在整个国家的体制转型和制度变迁过程的大环境中发生的,那么,为什么不同省市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会有差异——且整体来看差异甚大?在同一个制度、体制和政策环境和变迁过程之中,且各级各地政府的决策者均是以尽可能的高速增长为各自的施政目标和政策导向,加上大家同在一个以增长率为主要政绩考核体系的行政体制中运作的,那么,导致这些差异——且有些方面差异甚巨——的

原因到底是什么？这里，资源禀赋差异说显然说明不了什么。因为，从资源禀赋来看，浙江的温州地区并不比湖州好，台州的资源禀赋也不比金华好，浙江与广东的整体资源禀赋也不比山东和黑龙江好——那么，这些地区和省市经济增长与发展绩效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当然，人们有可能把不同省市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的差异归结为不同省市地区政府在不同政策措施和施政导向上的选择。但问题是，如果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各级和各地政府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刺激民营经济的发育与成长方面的政策、措施、步骤和实施时间上有差异，且这些差异确实是不同地区经济和发展绩效差异的一些重要原因的话，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这些政策举措方面的因素可能已不再是主要原因了。因为，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人们认识上的趋同，各省市和各地区政府在国企改革、引进外资和刺激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和手段也基本上趋同了。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在过去十几年中，各省市和各地区政府的改革力度、行政措施和政策选择以及施政导向，是导致不同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表现上差异的一些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决定因素。一个市场友善的政府（a market-friendly government）会为市场的扩展和发育提供宽松的空间和激励，但市场本身的发展和扩展却是市场本身的事。通过一些现实观察和理论反思，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体制安排尤其是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可以是“政策激励敏感”（a sensitive market for policy-incentive），而另一些市场则会对政府的政策措施“激励乏效”（incentive impotence）。是什么导致市场对政府的政策手段和激励措施反应出现差异？这是一个值得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高度进行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回到五省市近 20 余年经济增长和发展绩效的比较中来，我们会发现，从市场发育程度、增长路径、经济结构和经济成份来看，山东与江苏比较接近，而浙江和广东则是另一种增长和发展类型。从经济的整体成份来看，2001 年，山东的国有及其国有控股工业占全部国有

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近 30%，仅低于上海的 34.92%，而高于江苏的 15.83%，广东的 15.62%，更高于浙江的 6.41%。另一方面，从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引入外资来看，山东近些年在引进外资——尤其是韩资和日资——方面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把这两幅统计图景叠加在一起，自然会得出山东经济增长路径及其发展绩效不如浙江、广东、上海以及江苏的一个主要原因了，那就是导致中国经济近些年起飞的一个主要发动机民营经济的在山东的增长乏力。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本书并没有直接进行讨论，因而我们尚缺具体的数字来进行进一步的比较和分析，但我们可以从樊纲和王小鲁于 2001 年所组织中国市场化进程研究中有关山东与苏、沪、浙、粤的数据中得到一些佐证。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看，浙江排名全国第一，广东排名第二，而江苏、上海和山东则分别排名第五、第六和第七。^①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山东之所以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到底在哪里了，那就是民营经济增长乏力。

① 众所周知，江苏前些年民营经济发展的滞后，是江苏花大力气推行乡镇企业这一过渡经济的特殊模式之努力的一个短期历史结果，这就是所谓的“苏南模式”对“温州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对“浙江模式”的格局。近些年来，随着江苏乡镇企业的转制，“苏南模式”目前已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或者说已完成和基本上完成向“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的“接近”或言“蜕变”。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江苏近些年的民营经济发展是相当迅速的，而这种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方面是由原来的乡镇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制所促成的。如果说与江苏这一改革演化过程的特殊历史一幕相比山东民营经济的发展落后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山东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还不如上海，这就实在难能令人理解了。道理很简单。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中，由于改革开放前强大的国有制造业的体制遗产，加上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大公司巨额资本的大量涌入，民营经济在上海生成和发育的空间变得非常狭小。在众多国际资本涌入和强大国有经济的两方面的“挤压”下，除了一些“红顶商人”和周正毅之类靠行政关系而发家的个别投机家之外，上海已几乎不存在能真正从小到大自然发育成长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成长土壤。在上海民营经济增长步履维艰的这样一个格局中，诸大个山东省的整个非国有经济发展竟落后于上海，这实在是一个几乎令人不能理解的事实。当然，在解读樊纲和王小鲁的这个“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指标上，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个指标应包括民营经济与外资。由于上海引进的外资总规模要大于山东，山东与上海的这一差距还似乎可以得以解释。

山东的民营经济为什么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山东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落后于苏、沪、浙、粤？理清了这个问题，也就自然回答了山东的经济绩效和社会发展与其它四省市存在着一定差距的深层原因了。

这里应该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板子显然不宜也不能打在山东历届政府的屁股上。因为，一个无可置否的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历届地方政府都在国企改革、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上花了很大的力气，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做了尽可能做的工作。但问题是，为什么山东历届政府在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等方面所花的力气、所采取的措施与所做的工作与苏、沪、浙、粤比较起来相对“激励乏效”？在排除了资源、制度、体制、政策诸种因素后，我们目前只能留下一一种理论猜测：这可能与鲁国故地的山东人文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精神遗产有关。

三、商业精神与经济发展：浙江和广东的例证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已对文化精神、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链条做了一些理论梳理。在那篇文章中，笔者曾提出以下两个命题：(1)对经济增长而言，只有在一定文化氛围中的制度才是有效的；(2)文化传统对市场秩序的发育和扩展，进而对一个社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business spirit)来传递的。笔者的这些理论猜测，应该说在这部五省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尤其是由刘志英和张朝晖所撰写的“人文传统比较”一节，从一个侧面更说明了这一点。

把五省市过去 20 余年体制改革、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路径及历史轨迹的外征做一综合评估，人们会发现，从不同经济成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来看，这五个目前中国最发达的省市可以被划分为两组：一组是浙江和广东，这些年其经济增长的主动动力机

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①另一组则是上海和江苏，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资的大量涌入而引致和拉动的，另外，国有企业转制所引致的效益增进也是后一组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量，尤其是在上海更是如此。综合考虑，尽管山东在引进外资规模和范围上与江苏和上海相差很大，但山东经济的历史演化路径所呈现出来的总体特征，使之更加接近后一组，即上海和江苏。尤其是在 2000 年之后，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更趋同于后者，而不是前者。

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民营经济在浙江和广东率先成长起来？这里面有许多自然环境（如广东珠三角地区靠近港澳）、地方政府的思想解放以及在改革开放早期采取了一些较适宜的激励和鼓励政策等因素，但这些因素显然并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毋庸置疑，山东和中国其它省市的地方政府近些年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激励措施，并出台了多种优惠政策，那么，为什么山东和其它省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就不像浙江和广东那样有效？难道中国各省市自治区不是同处在一个体制转型的改革进程和基本制度安排的变迁过程之中？

沿着这条探究思路，我们会慢慢梳理出来这样一种理论猜测：这些年浙江、广东以及后来的江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江浙和岭南一带的人文传统的资源遗产。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这两个省及其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和激励措施，只不过是原来压抑着的这些精神资源的自然张扬及其向市场运行中的商业精神的自发转化提供了合宜的“制度空间”和“社会氛围”。

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

^① 当然，外国尤其是港澳台的直接投资在广东的经济增长中无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上更是如此。但这不应否定民营经济的发展是近些年广东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这一事实。

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不过是人们交易、交换与交往的一个整体称谓。既然市场、经济与社会说到底只不过是人参与其中的一种活动,那么,参与者们自己的精神导向及其主动性(activeness),在任何社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中,以及在任何历史时期中,无疑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市场经济活动说到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那么,市场参与者的从商精神或言商业精神及其动机(motivation),自然就成了市场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说,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并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

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就会逐渐梳理出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民营经济在浙江和广东的珠三角地区率先崛起的文化和社会原因了。近些年到过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以及到过广东的珠海、中山和东莞的人,可能会发现,这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可谓是城镇有自己的企业群,村村有工厂和作坊,家家都在“经营”,人人都在谋划着赚钱发财、都想成为一个生意人或企业家。在这样一些弥漫着现代商业精神和经营意识的地区,市场焉能没发展? GDP 焉能不增长? 经济焉能不会起飞? 人们焉能不富裕? 在这一方面,温州以及浙江的民营经济确实是一个突出的范型(prototype)。毫无疑问,温州模式以及广义的浙江模式,不仅创造了过去的辉煌,而且也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希望。

那么,是什么因素引致了温州和浙江民营经济有如此强劲的增长? 一个简捷的回答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有赖于数十万浙江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意识和商业头脑。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浙江、广东、以及江苏的不可胜数的民营企业家们这样有商业头脑、经